

想报名先摇号： 临汾教育新政被指打压民办校

在临汾民办教育遭遇“有形的手”强力“规范”的背后,是其公办教育的长期畸形发展——少数优质公办校“一票难求”,多数低水平公办校面临生源严重不足的尴尬,不得不与民办校正面交锋。

■ 本报记者 张艳蕊

5月上旬,山西临汾出台了规范民办学校招生的《临教办[2013]12号文件》(以下简称12号文件)。12号文件将以往小升初报名人数民办学校的数量从不限改为一所,对于极度热门的民办学校,报名能否成功还要靠摇号最终确定。

12号文件甫一出台,立即引起了很多学生家长的恐慌和不满。并有教育界人士质疑,临汾教育局此举名为规范民办校招生,实则是用打压民办教育的方式来解决公立学校生源不足的问题,用行政手段这只“有形的手”来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进行搏杀,有过度行政干预之嫌。

家长:不应遏制 民办校发展公办校

徐先生户口所在地是临汾市下属某县某村。他已在临汾经商10多年,孩子一直在临汾上学。今年小升初,因为没有当地户口,按孩子的成绩,无法进入临汾最好的公办中学就读,所以他们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优质的民办中学上。

而12号文件规定,每个学生只能申报一所民办中学。“为了保证成功率,只能往低了报。否则孩子若报高了没考上,就必须去升学率比较低的公办校或者回老家上学。”徐先生焦虑地摇摇头说,“上差校,我和孩子都不甘心。实在不行,就只能去运城、太原、平遥去上学了。可孩子小,不放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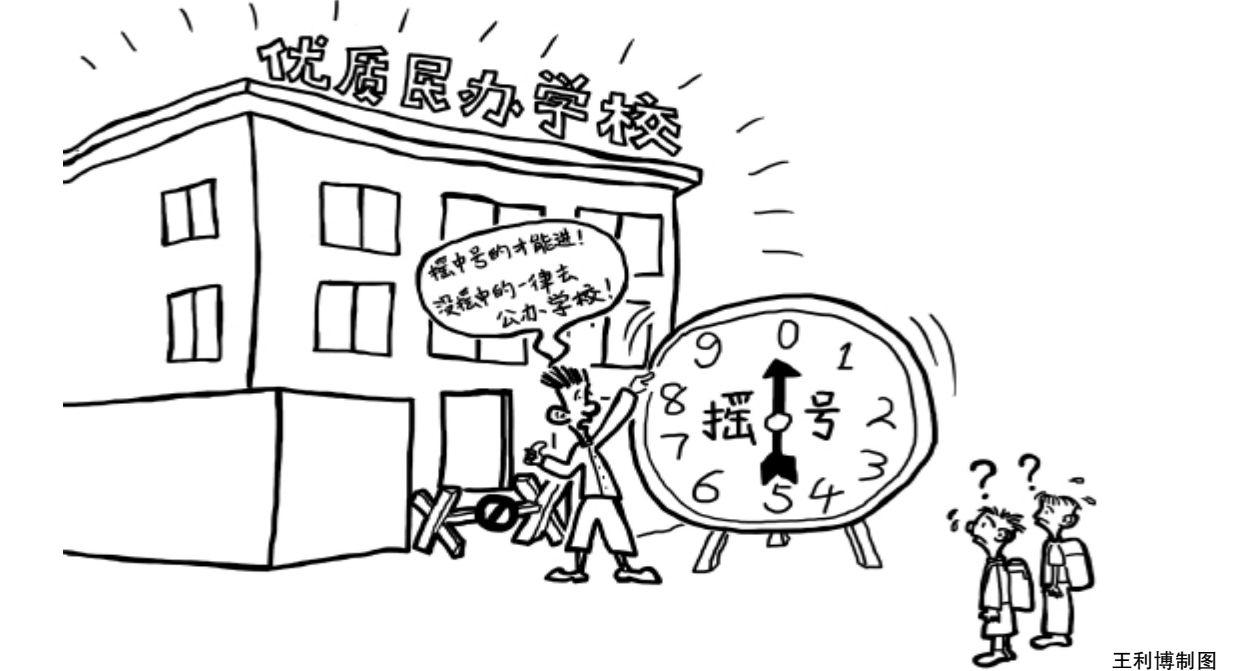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12号文件中看到,临汾市教育局提供了三种面试资格确认办法供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学生选择:

第一种方式是确定招生名额,报名人数无限,最后以摇号方式确定参加面试的学生名单(面试学生数量最多为招生名额的四倍);第二种是确定招生名额,报名人数只能是招生名额的四倍,报满为止;第三种是确定招生名额,报满为止,不组织面试。

12号文件强调,每所学校只能选择一种面试资格确认办法。

“这三种方式的结果是学生只能有一次报名机会,只要不被录取,就要回户口所在地公立学校就读。”一位王姓家长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即使是高考也有几个志愿可填报,北京、上海小升初推优有四五所优质重点中学可填报。12号文件就是一项压制、歧视性政策,剥夺了孩子们选择优质学校的权利,特别是山区的孩子和没有社会背景家庭的孩



王利博制图

子。”一位孙姓家长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公立学校办不好,教育局应该反思,而不是遏制民办教育,应通过民办教育促进公立学校的发展。”在平阳中学张贴着新的招生规定的收发室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有关系、有背景的家庭可以选择临一中、临三中这样优质公立学校。”一位家长无奈地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普通老百姓只能靠孩子自己考,原来都是有几个学校就报几个学校,考上哪个上哪个。可现在这个规定竟然剥夺了孩子报考一所以上优质学校的权利,万一摇号都摇不上,我们连报考的机会都没有了,我和孩子都感到很绝望。”

教育局： 新政初衷为规范招生

《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12号文件写明,新政策是“为进一步规范全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工作,解决好义务教育民办学校招生中存在的无序竞争、重复选拔、生源失衡、超规模招生、乱收费等突出问题,消除招生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没有人愿意吃这个螃蟹,我们也可以不作为。”临汾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志感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份文件是通过多次开会研究并召开听证会,通过后才下发的。新制度、新规定都有个适应过程。”

据张志感介绍,目前临汾市管民办校共12所。2012年,临汾市小升初民办校招生约4300人,报名人数达4.2万人,而当年,全市毕业生约5.3

万人,报名民办校的毕业生达80%以上。而教育局调查发现,这其中存在“一人报多所、不是应届毕业生也参与报名”的情况,造成重复面试、重复录取、无序竞争。

“我们在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学可上的前提下,把民办校招生管理纳入整个招生管理范围。”张志感详细给《中国企业报》记者解释了12号文件中有关“适度均衡生源”中的详细规定,“由于过去的无序报名、无序录取,出现生源过于集中,也对公办校造成冲击,使有些公办校现有资源造成浪费。所以我们今年要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全面掌握学生的信息。”

“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临汾确实存在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张志感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坦陈,“近几年,由于城市扩张规模不断加大,公办校无法容纳大量涌入的外来学生,民办校正好满足了这部分学生的需求。但是,好的生源过于集中到优质校,而公办优质校容量有限,所以,民办优质校成了学生争夺的焦点。这样也造成了很多公办校、尤其是农村校生源严重不足,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张志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教育局一直积极通过多种渠道与不理解的学生和家长沟通,并在操作层面上出台细则。5月26日,临汾教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此前家长反映最多的“限报一所学校”调整为“可报两所”。

民办校:市场化需求 遭遇“调控”之手

“其实,学生就是想有个面试的机会。”民办校平阳中学校长杨东俊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去年计划招生500人,结果有9000多人报名,义务教育阶段又不能考试,我们就在操场面试,确实给学校增加了很大工作量。但是,从这些年的情况看,那些面试没有通过的学生并没有怨言。”杨东俊预测,12号文件实施后,可能会在报名资格问题上留下隐患。

平阳中学是由临汾市优质公办校临汾一中以8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资,由180名老师集资建起的学校,目前已经是学生认可的临汾优质民办校之一。同为民办校的同盛中学则完全是由企业投资办学,目前也已经发展成为当地学生首选的一类优质校。其董事长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不便过多评价,新政策对民办校的影响肯定存在。由于学校招生数量有限,可能会造成一些优秀学生摇号上号却未被录取,其后果是就连上二类、三类校的机会都没有了,可能会耽误一些优秀生。”

“规范招生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教育改革不能一味就均衡而抓均衡,应是抓优质的均衡教育,用优质校带动差校,而不是强硬把学生分流到差校。”学生家长王先生主动联系了《中国企业报》记者,据他介绍,临汾每年流失到运城的学生有2000多人,流失到太原、平遥一带的学生有2000多人,若今年采用此种招生办法可能有大批学生离开临汾异地就学。也可能还有大部分学生在户口所在地报名,保留学籍,出去找学校借读。

“这样会不会滋生腐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质疑,“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对学校和孩子都有补贴,挂名学生的补贴谁来领取和使用?”

观点

排斥竞争不如提高教育质量

■ 本报记者 张艳蕊

山西临汾教育新政是否如家长所质疑的属于行政干预过度?如何确保教育均衡发展?为此,《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公共行政管理专家、政府财政部门人士以及民办校管理者。各方观点一致认为,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促进教育协调发展已是当务之急。

“12号文件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种无奈的应对,临汾民办教育有些‘过头’了。”临汾市平阳中学校长杨东俊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临汾公办校与民办校严重失衡,造成有些公办校生源不足,造成整个教育资源的浪费,“公办校甚至出现了9个老师给10个学生上

课的情况。如果民办校这样无节制地膨胀下去,肯定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失衡。”

但是,在分析临汾公办校与民办校生源失衡的原因时,杨东俊并不认同“历史原因等客观情况形成”的说法。杨东俊认为,是管理机制不同造成了这一结果。“公立校教师录用后,就进入财政编制,老师福利好,设备投入多,因此,吃大锅饭的情况一直存在;而民办校机制灵活,待遇留人的同时,每月还有很多的课时工资,奖金与升学率挂钩。”

“教育局不能办出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家长们无奈地选择民办校,这本身就是政府把负担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杨东俊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反思的是如何在投入巨大的情况下

提高教育质量,不管公办还是民办,学校完全可以进入市场自由竞争。

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某市财政主管教育的公务员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生源严重不足的学校要撤并,随之造成的后果是,不但原来的财政上的教育经费和投资减少,教职员工的安置都成为问题,教育局当然不愿看到部门利益受损的情况发生。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伟东认为,假如有充分证据证明民办校的招生确实存在违法行为,如乱收赞助费,违规招生,或者进入民办校存在歧视、不公平等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去干预,制止违法行为,能够使民办校的招生有序与公平,当属于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权限

之所在。除此之外,仅因为民办校更受学生追捧或偏爱,或出于解决公立学校生源不足,出台这项政策,就有行政干预正常招生秩序之嫌。“事实上,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与其去限制学生报名,不如去反思公办校运营有什么问题,并致力于提高公办校本身办学的水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4万多考生争考民办校4千多招生名额的现状。”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国家正在大力倡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其中农村教育资源可能是关键之一。农村学生无序涌入城市学校,是对教育资源的一种市场化需求,如果农村公立校占有着优质资源,却无法达到优质教育水平,那最终将被市场淘汰,同时也将严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湘西 34 亿元集资案余波

(上接第一版)

2008年9月4日,吉首福大房地产公司部分集资者因无法收回集资款,到州政府告状,引爆了堵火车严重群体性事件。当天下午,吉首市政府出台告示,曾经风光无限的集资行为被定性“非法”,并迅速出手打击。

2008年10月2日夜,吉首市政府召开22家民营企业高管会议,近百人全部被警方带走,曾成杰成了其中之一。

2008年11月11日,曾成杰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12月18日,批捕时,罪名变更为“涉嫌集资诈骗罪”。

资产处置存疑

据报道,三馆公司资产包括占地65亩的吉首市商贸大世界、三馆城市之光项目、邵阳新林国际大酒店、贵州铜仁湘黔矿业子公司、东北矿业子公司等项目,在接受政府处理前,上报的总资产为23.8亿元。

湖南省高级法院依据华信司法鉴定所的鉴定认为,截至2008年9月30日,三馆公司集资总金额为34.5亿元,涉及24238人,累计达57759人次。扣除已还本息,集资诈骗额近8.3亿元,直接给群众造成损失6.2亿。华信的会计鉴定还显示,三馆公司资产总计7.7亿元,负债18亿元,资不抵债。

王少光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资产评估不能被会计鉴定所取代,必须对资产的本身价值及其盈利空间进行综合评估才能代表资产的价值,而仅仅用会计鉴定显然是一种缩水的估值方式。

王少光提出,当事人没有挥霍集资款。根据华信会计事务所的鉴定结论,剔除已退本息及集资奖励,三馆公司实际投入生产活动的资金大于可以使用的资金将近0.6亿元。

据湘西州委机关报《团结报》报道,湘西州政府曾于2008年12月21日通报了吉首非法集资企业的资产评估结果,三馆的资产总额为6.47亿元,一个月后又通报了拍卖情况,拍卖价格比评估值增长了21.7%。

在法院一审裁决之前,相关资产还未被正式定性,就已被事先贴上“非法”标签并处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认为,这违背了刑法关于财产处置的规定,“除非是死亡或者逃逸,否则必须在法院的判决生效之后才能处置。”

另外一个焦点是,案件属于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陈兴良、张泗海等四位法学家出具的《专家论证意见》认为:“三馆公司对外集资的决策由公司集体作出或者公司负责人依据公司决策程序作出,集资所得款归单位使用,应认定集资行为系单位行为,构成单位犯罪,而不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

据了解,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自然人犯“集资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

在湘西多起集资案件中,亦有多家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被认定构成单位犯罪。

5月30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来到吉首,在繁华的商业地段,原来三馆公司最大的地产项目(24万平方米)如今已变成了“财信商贸中心”。据工作人员介绍,商住楼每平方米3800左右,商铺每平方米3到4万元,6栋高层建筑已经基本销售完毕。

评估报告神秘浮出

“三馆公司的资产,二审结束后评估仍未进行,但是实际早已被拍卖,这说明三馆公司应该有资产评估报告,但却被人隐匿起来,没有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2012年年底,王少光律师两次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调取资产评估报告以及资产拍卖资料并开庭质证的请求。

2013年3月,这份关键的证据——《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及相关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复印件浮出了水面,该报告由吉首市政府委托湖南开元资产评估悠闲公司完成,其编号为:开元(湘)评咨报字[2008]第002号。这份以2008年8月31日为基准日的报告显示,三馆公司的总资产评估价值为8.29亿元,清算价值为6.47亿元。

这与《团结报》中的三馆公司资产评估6.47亿元的数字吻合。

据了解,这份报告是由一名不愿暴露身份的内部人士从武汉辗转邮寄到王少光手中,“收件人地址是我的,但是收件人却被错写成另外一位报道湘西案的记者。”

王少光认为,根据湘西州政府《团结报》2009年1月8日发布的数据,三馆公司资产的拍卖价为10亿元以上,按照湖南政府处理湘西民间融资“只还本金、不计算利息”的政策偿还了7.1亿元集资本金,那么尚有2.8877亿元的盈余。因此,公诉机关所诉的“三馆公司给融资群众造成6.2亿元的经济损失”,实属无稽之谈。

5月27日,王少光前往开元评估公司对报告内容进行核查。公司副总经理陈迈群向王少光介绍说:“该资产评估报告已经交给了委托机关好几份,我们也有存档。如果司法机关来,我们可以提供存档的该资产评估报告。”目前,王少光已把该报告复印件以及核实情况书面汇报给最高法院。

《中国企业报》记者前往开元公司采访时,该评估报告项目负责人何颖伟的答复与陈迈群的基本一致。为何评估8.29亿元,清算价值却为6.47亿元?何颖伟说,因为资产要在一定期限内变现,所以必须降价出让。他还介绍说,公司一共派了10多人参与,自己在吉首待了20多天才完成评估。

曾成杰以遗书的抬头写给儿子和女儿的信中,更多是在陈述自己的辛酸处境和冤屈。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曾成杰在给孩子遗书中,明确提出希望能让审理吴英案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审法官来审理他的案子。

“孩子:爸爸很可能等不及法院的公正判决那一天了,若万一惨死在监牢里,你们也不用过于悲哀!因为我活着比死还难受。”如今,湘西集资案案发已去4年半,一直在看守所等待死刑复核的曾成杰,生命似乎比资产更重要。